

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

再度越海向台湾延伸，使闽台两
它以闽南方言和部分客家方言
式，民间信仰、民族习惯，
特征的文化风貌。尽管
与福建不同的遭
传统，表现
族本位的
形态的
同

闽台文学 的文化亲缘

朱双一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闽台文学 的文化亲缘

张一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朱双一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7

(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

ISBN 7-211-04372-5

I. 闽... II. 朱... III. ①文化研究—福建省、台湾省②文化交流—研究—福建省、台湾省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8603 号

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

MINTAI WENXUE DE WENHUA QINYUAN

-
- | | |
|------|--------------------------------------|
| 作 者 | 朱双一 |
| 责任编辑 | 卢 和 |
| 装帧设计 | 林德锋 |
| 出版发行 |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
| 电 话 | 0591-7533169(发行部) 7521386(编辑室) |
| 印 刷 |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塔头路 2 号 (邮编:350011) |
| 开 本 |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
| 印 张 | 15.125 |
| 字 数 | 347 千字 |
| 版 次 |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7-211-04372-5/I·108 |
| 定 价 | 24.20 元 |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台湾问题是萦系在海内外所有中华民族子孙心里的一个最牵动民族感情的问题。一个多世纪来,台湾无论沦入日本的殖民统治,还是处在两岸对峙的政治纠葛之中,都是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存在着,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压力下,都不能把它和祖国分开。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同胞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子民;台湾社会和祖国大陆社会一样,都是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建构和发展的。共同的文化,是一股潜在的、巨大的力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维系台湾与祖国密不可分的精神支柱。这一切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中国人的纽带,也是实现祖国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

台湾与祖国的文化亲缘关系,最先、最直接的就体现为台湾与福建的关系。这是由历史决定的。福建和台湾,都是以中原南徙的移民为主体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稍有不同的是,在福建,中原移民南徙入闽,至宋代已基本完成;而在台湾,则是自明末清初开始,才由南徙入闽的中原移民后裔再度大规模迁入台湾。其文化的延播,也随同移民一起,从中原经由福建的本土化发展,再度播入台湾。因此,闽台社会都先后经历过一个共同的内地化、文治化,实质也就是中原化的过程。闽台被视为一个共同文化区,皆因其文化有着历史形成的密切亲缘关系,追索闽台文化的来路,也必然寻根

到中华文化的源头。作为闽籍的文化学者,我们无论在进行福建文化研究,还是在探视台湾文化的发展,都为闽台文化共同源于中华文化而又呈现出多样形态的魅力所感动,也深感有责任揭示闽台文化这种同根共源的密切亲缘关系,以更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为此我们编辑了这套“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

丛书既名“闽台文化关系研究”,顾名思义,是以文化为讨论对象,以关系为切入点,在闽台的背后,涵盖的其实是两岸,所涉及的也不单纯只是文化问题。它是以闽台为中心,以文化为重点,来论析两岸关系的一套系列著作。丛书的选题,包括了林国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闽台区域文化研究”,刘登翰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基金项目“两岸文学艺术的文化亲缘研究”,以及福建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大项目“闽台文化关系研究”等诸个课题。作为闽台文化关系的系列研究,本丛书原计划还有其他一些选题,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未及列入或未能完成,希望今后能有机会继续组织撰写,以使这一系列研究更加完善。

在本丛书的撰写和出版中,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福建社会科学规划办,以及丛书作者所在的各个单位,都给予大力支持。福建人民出版社从丛书的筹划开始,就投入人力、物力参与组织工作,该丛书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学术界的许多前辈同侪,也对丛书的撰写给予许多指导和帮助。对上述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我们表示深切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刘登翰 林国平

2002年9月

第一章 导论：闽台文化之特征	1
第一节 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与区域文学特征	1
第二节 闽台文化的地域特征	6
一、闽台文化的“海洋性”特征	6
二、闽台文化的“边缘性”特征	9
三、闽台文化的“多元反差性”特征	14
第三节 闽台文化的核心要素及其中华文化属性	18
第二章 海洋意识和遗民忠义传统	25
——明郑前后闽台文学的初步遇合	
第一节 抗倭靖海 眺望台湾	25
一、海洋：开闽中国传统文人的视野和心胸	25
二、中国“海战文学”的滥觞	28
第二节 遗民气节 一脉相承	35
一、郑成功父子的创作及宁靖王之绝命诗	35
二、闽台源远流长的“遗民文学”传统	42
第三节 东林后劲 乡愁文学源头	49
一、海外几社与经世思想的经闽入台	49
二、乡土文学：卢若腾对民生苦难和闽台文化的反映	56
三、乡愁与乡土、思归与扎根的辩证	61
第四节 从割据走向统一	65
一、禁海、迁界和施琅克台	65
二、有关海洋及台湾之战略地位的思考	72
三、闽人写闽事 褒扬明末忠义	80
第三章 风土杂咏和雷学敏化	87
——清代中叶闽台文学的深层对接	
第一节 发现台湾：风土杂咏诗风之流播	87
一、身心老成的传统文人与荒莽台湾的遇合	87
二、描绘台湾潮流中的《小琉球漫志》	94

三、扩充见闻于海外的《海南杂著》	100
四、风土杂咏诗的福建渊源	102
第二节 以闽学为基本传承的教化	105
一、从海滨邹鲁到海东邹鲁	105
二、“追溯高风仰宋贤”，“道延一线合真传”	114
三、“闽泉旧族”章甫的理教和诗教	118
四、理学在竹堑郑氏家族创作中的投影	122
第三节 “家族文学”的形成及作用	128
一、闽台大家族及“家族文学”的形成	128
二、维护家族德固和家庭伦理的郑用锡等人	132
三、林占梅的宗亲、族亲和乡梓之情	136
四、家族园林中的交游酬唱和切磋磨砺	141
五、台湾南、北、中的家族性文学群体	146
第四节 儒学教化对于粗陋民风的疏导	150
一、《海音诗》：兴利除弊的黄钟大吕之声	150
二、《陶村诗稿》：分类械斗的描述和劝戒	156
三、儒家教化对于鬼神巫覡之风的纠正	162

第四章 主战、内渡和近代变革

——割台前后闽台文学的交流互动

第一节 近代闽台反抗外来侵略的“主战”传统	171
一、禁烟、“射鹰”和死战：鸦片战争中的闽人	171
二、饿死亦不肯为犬羊之奴：鸦片战争中的台民	179
三、牡丹社事件和抗日前奏曲	181
四、粉碎法夷“据地为质”的阴谋	184
五、“有诏班师臣不幸”：遭遇割台之厄的台湾军民	186
第二节 内渡和留台作家的互动及其民族气节	191
一、兴盛一时的歌咏郑成功的诗文创作	191
二、海峡两岸的相互眺望	195
三、沉潜和奋起：台湾文人在闽创作活动	199

四、留台文人的悲愤和洪弃生等的弃地遗民气节	206
五、“击钵吟”的盛行及其意义和缺失	212
第三节 走在中国近代变革前列的闽台	221
一、发展船政、培养经世人才的沈葆楨	221
二、闽籍近代文化名人：从改革走向保守	226
三、连雅堂等台湾文人的革新倾向和传统情结	232
第四节 闽台诗坛唐宋诗风的起伏消长	242
一、福建诗坛与“唐宋之争”	242
二、“宗唐”与“宗宋”在台湾的传衍和交融	248
三、日据中期台湾“宗唐”诗风的再起	254

第五章 新文化的冲击和洗礼..... 257

——现当代闽台作家的双向环流

第一节 五四新文学的火种东传	257
一、五四浪潮中的留厦台湾学生运动	257
二、赖和在鹭岛：确立关心民众、医治国病的方向	264
三、张我军于厦门：接受五四新思潮的前奏	269
四、参与左翼革命活动的旅厦台湾作者	273
第二节 闽籍或经闽人台作家的贡献	283
一、郁达夫漫谈闽文化及其台湾之行	283
二、覃子豪的《永安劫后》组诗和《海洋诗抄》	291
三、活跃于闽台文坛的雷石榆	296
四、写出台湾文学“好样本”的福州青年欧坦生	302
第三节 厦大校友中的当代台湾文坛名家	307
一、推动厦大抗战剧运的王梦鸥	307
二、姚一苇：树立献身戏剧志向和为人生艺术理念	315
三、厦门——余光中文学的发祥地	327

第六章 文化形态和民性特征..... 336

——闽台新文学中的历史、宗教、民俗和语言

第一节 文学反映的闽台历史及其相互关联	336
---------------------------	-----

一、闽台现代文学中的抗倭驱荷民族英雄形象	336
二、械斗的恶习及天地会的仇恨	344
三、闽台作家对于抗日斗争的描写	348
四、“台湾浪人”在厦门	353
五、台湾海峡硝烟的升起和散去	357
第二节 福佬和客家:闽台民性特征	361
一、客家人:质朴、保守、刚毅的山地子民	361
二、福佬人:遵奉“爱拼才会赢”的准则	373
三、山与海的互补:福佬和客家的交汇	381
第三节 佛教禅理在闽台文学中的投影	390
一、闽台佛教禅理文学的特色	390
二、许地山:佛学义理与亲情观念的融合	393
三、当代台湾禅理散文	397
第四节 台湾新文学中的民俗描写	404
一、早期新文学中民俗描写的反帝反封建的双重意义	404
二、“皇民化”压力下保存汉民族文化的曲折手段	412
三、回归传统:当代台湾乡土文学的民俗描写	423
第五节 闽南方言在台湾文学中的应用	435
一、闽南方言的历史渊源及其与普通话的辩证关系	435
二、台湾新文学作家的方言词汇、句法的运用	438
三、俗语、歌谣等展现的闽台文化灵魂	445
四、台湾、闽南、中原:闽台方言的流与源	453
主要参考文献	460
后 记	477

第一章 导论：闽台文化之特征

第一节 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与区域文学特征

不同区域文学间的差异和变迁，缘于“种族”、“环境”和“时代”等三大要素，古今中外的史家学者，对此多有揭橥。先秦之诗经和楚辞，已初显文学的北南之别。汉代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指出了各地风俗民情与地理环境之密切关联。此后班固《汉书·地理志》更直接揭示了文学创作与地理、民风等的关系。它按秦、魏、周、韩、赵、齐、鲁、宋、卫、楚、吴、粤等十二地域，“凡有诗见于《国风》者，皆具引之”，盖由诗以知俗，由俗以明诗，“此尤足证诗与地域之关联也”。^①如以“舒緩之体”指称齐诗（《齐风·营》、《齐风·著》等），后世遂有“齐体”、“齐气”之称。南北朝时刘勰所撰《文心雕龙》中“文变染乎世情，废兴系乎时序”的说法，为人们所熟知和普遍认同。到了近世，刘师培倡言“南北文学不同论”^②，而汪辟疆则有《近代诗派与地域》论及文学流派与地域的对应关系，称：“若夫民函五常之性，系水土之情，风俗因是而成，声音本之而异，则随地以系人，因人而系派。溯渊源于既往，昭轨辙于方来，庶无讹焉。”又称：“夫文学转变，罔不与时代为因缘”；“而诗之内质

① 见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之吴蔡小笺残本，《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页。

② 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刘师培全集》（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556页。

外形，皆随时代心境而生变化”，“心境与世运相感召，遂不觉流露于文字间也”。^①梁启超更撰《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在该文之序中写道：

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上生活；物质上生活，还直接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环境对于“此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②

在国外，最为著名的是法国社会学派文艺理论家泰纳提出的“文学三元素”说。承续自史达尔、黑格尔等的这一理论，提示我们在考察某一区域文学、文化的特征时，既要注意该区域人民的“种族”因素，也要注意他们身处的“环境”因素，此外还要注意在历史长河中社会变迁、文学传承和革新的“时代”因素。

所谓“种族”，是一种邈远时代就已形成的代代相承的血脉联系，这种联系既是生理的、血缘的，同时也是心理的、文化的。它构成了一个相当广大人群的“集体潜意识”或共同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也提示了一种由相同或相近的语言、道德规范、思维、情感和行为方式所构成的文化的“大传统”。它并不因为成员迁徙、散居于不同的地形、气候等地理环境中，甚至也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有根本的改变。尽管“种族”可能分成若干有着种种区别的支派，但是“在它的语言、宗教、文学、哲学中，仍显示出

① 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汪辟疆文集》，第292、283页。

②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序》，引自葛懋春等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56页。

血统和智力的共同点，直到今天，这个共同点还把这一种族的各个支派结合起来。这些支派虽然不同，但他们的血统并没有被消灭……原始模型的巨大标记仍然存在，我们仍能从时代所给予他们的第二性的痕迹下面，发现原始印记所含有的两个或三个显著特征”^①。

所谓“环境”，既包括自然的、物质的环境，也包括人文的、社会的环境，“因为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偶然性的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的原始的倾向，并且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了干扰或凝固的作用”。^②如冷暖、干湿等气候因素，地形、位置、交通条件等地理因素，以及政治、经济、宗教、法律、教育等种种人文社会因素，都可能使原来同出于一、而后分散于不同“环境”中的人群，产生各自的文化个性。它提示了某种区域文化“小传统”的存在。

所谓“时代”，指的是在“种族”和“环境”都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文学还受其所发生的那一“顷间”（时刻）的影响。或者说，文学的发生都是有所传承的，这一刻和在它之前或之后的任何时刻，其发生的背景都已经有所不同，然而彼此的影响依然存在。正如泰纳所说的那样：“当民族性格和周围环境发生影响的时候，它们不是影响于一张白纸，而是影响于一个已经印有标记的底子。人们在不同的顷间里运用这个底子，因而印记也不相同；这就使得整个效果也不相同”。“因此一个民族的情况就像一种植物的情况；相同的树液、温度和土壤，却在向

① [法] H·A·泰纳：《〈英国文学史〉序言》，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37页。

② 同上。

前发展的若干不同阶段里产生出不同的形态，芽、花、果、子、壳，其方式是必须有它的前驱者，必须从前驱者的死亡中诞生”。^①

根据泰纳的这一理论来观察闽台地区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从“种族”这一要素看，闽台两省的绝大多数人民其“种族”身份为汉族，因此必然与汉族整体有着某种血脉相连的关系。由于人种并不是纯生理的血脉延续，同时也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因此他们必然具有汉族共同的“集体潜意识”和某种从汉族文化固有的中心——中原地区——播迁而来、无论经历多少迁徙和变动也无法抹去的文化“大传统”。在历史上，中原汉族有4次较大规模的人迁福建，即西晋末年的八姓入闽、唐代陈元光的开发漳州（陈政入漳）、唐末五代河南固始王审知治闽以及宋室南渡时北方百姓的南迁浪潮等。而台湾的汉族人民，则主要是明郑、清朝时期先后由闽、粤等地移居台湾的，且汉族人口比例高达总人口的98%。这一情况就使得福建人，连带地使得大多移民自福建的台湾人，其远祖籍贯为河南者占有极大的比例。如1953年台湾的户口统计，当时全岛近83万户中，户数在500户以上的100种姓中，有63姓的族谱资料说明其先祖是晋、唐时期从河南迁徙入闽的。这63种姓计67万余户，占全省总户数的80.9%。^②这种血脉、种族上的规定性，使得闽台文化必然以中原文化为根基，同时也是我们将闽台列为同一文化区域的根据之一。或者说，在闽台社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必然是以中原文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模

① [法] H·A·泰纳：《〈英国文学史〉序言》，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第239~240页。

② 刘登翰等：《台湾文学史》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式为蓝本，而他们的语言、文化、心态、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也必然葆有承自中原汉族的传统。这种中原文化“大传统”，其基础即儒家思想，而基础之核心则为以“三纲五常”为基干的伦理道德体系。这一传统提倡忠君爱国，仁人爱物，以各安其位、“不语怪力乱神”的“君子之道”，取代具有超自然因素的宗教，并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演进中，塑造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温良有礼、安土重迁的性格，重农抑商的物质生产方式，宗法式的伦理道德，以及追求心灵与理智完美和谐的精神特征。

值得指出的是，就“种族”要素而言，我们不能忽略了闽台文化中存留的远古时代百越民族的文化基因。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闽台的民系，不管是福佬或客家，却贵巫尚鬼，迷信风炽，这应与古越族“信巫重祀”传统的遗留有关。又如，远古时代处于中国南方的百越民族，就以“珠贝”、“舟楫”和“文身”这三项重要的海洋文化特质，区别于华夏族大陆文化的“金玉”、“车马”和“衣冠”。^①虽然福建的古越族，在汉人南下之后，或被同化，或被迫迁移，现在似乎已经消失无踪，但其血液，其实融入了汉族之中。在台湾，当今所谓“原住民”其实亦为古代百越民族之后裔，而从古代起，就已出现“汉番通婚”的现象，平埔族更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血液相互融合的明证。古越族文化基因的留存，构成了闽台文化有别于中原文化的地方特质的一部分。

不过，构成闽台文化特质之根本，却在于“环境”和“时代”的要素。特别是“地理环境”的影响，在闽台文

^① 凌纯声：《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337~339页。

化特质的形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就“地理环境”要素中的“气候”因素而言，闽台都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但中国在同一纬度上，气候相似的省份还有不少，这并不成为决定文化特质的主要因素。对闽台文化特质影响最大的，应数“地形”和“位置”，它们直接决定了闽台文化的“海洋性”和“边缘性”的特征，同时对于闽台文化的“多元性”和“两极反差性”特征的形成，也有延伸的、间接的意义。

第二节 闽台文化的地域特征

一、闽台文化的“海洋性”特征

台湾四面都是海，岛屿中脊则为海拔数千米的崇山峻岭；福建三面是山，东面是岛屿港湾密布、弯曲漫长的海岸线。尽管闽台都是有山又有海的地形，但是主要人口都集中于沿海地带，使得“海洋”在闽台文化的构成中，扮演着一个最重要的角色。

有一种源自黑格尔而流传甚广的观点，认为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海洋型文化，以商贸为其经济重心，是一种动的文化，具有冒险、扩张、开放、斗争等特点；而东方文化所代表的内陆型文化，以农耕为其主要生产方式，具有保守、苟安、封闭、忍耐等特征。梁启超曾引用并赞同黑格尔所言：“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①有关“海洋文化”的特征，国人曲金良主编的《海洋文化概论》一书有颇为详尽的概括：1. 就海洋文化的内质结构而言，是它的涉海性；2. 就海洋文化的运作机

^① 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文集第四册），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108页。

制而言，是它的对外辐射性与跨海联动性；3.就海洋文化的价值取向而言，是它的商业性和慕利性；4.就海洋文化的历史形态而言，是它具有开放性和拓展性；5.就海洋文化的社会机制而言，是它具有社会组织的行业性和政治形态的民主性，相应的也就具有法制性；6.就海洋文化的哲学与审美意蕴而言，是它具有生命的本然性和壮美性。人类的生命和文化起源于海洋，海洋自然天性的浩瀚壮观、变幻多端、能量巨大、自由豪放、奥秘无穷，都使得人类视海洋这一生命的舞台为生命本能的对象物，为力量、智慧的象征与载体，它所具有的硬汉子强人精神，崇尚力量的品格，崇尚自由的天性，强烈的个体自觉意识，强烈的竞争冒险意识和开创意识，悲剧意识，激情与浪漫，壮美心态等，都与大陆文化的讲求以柔克刚，中庸之道，温良恭俭让，三思而后行，靠天吃饭，老道守成，本分，禁欲，节度，安逸，知足常乐，柔美心态，大团圆结局，老人经验……，迥然有别。^①

与此相对照，闽台文化的海洋性特征昭然若揭。如福建的古城泉州，早在宋元时代就成为四方来客云集的东方第一大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连接日本、东南亚乃至阿拉伯世界的枢纽，这正是其对外辐射性和跨海联动性的体现。又如，由于地狭人多的人口压力，数百年来福建民众大量向台湾和南洋迁移，他们面对着随时要夺人性命的险风恶浪、黑潮浊流，充分体现出勇于冒险犯难的精神；而每到一片新的土地，则筚路蓝缕，开辟草莱，表现出强烈的开拓性。这一点，在数百万赴台的闽粤移民中，表现得至为明显。然而，最能体现其海洋性特征且意义深远的，还在于它的商业性和慕利性。北宋时福建惠安进士谢

① 曲金良主编：《海洋文化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5页。

履所作《泉南歌》“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①，已触及闽地人民因人稠地瘠，单靠耕种难以维生，于是将眼光投向浩瀚无穷的海洋，“以海为田”，通过海外贸易求财富、求生存的现象。然而，历代统治者对海洋的看法，往往难以跳出以陆地农耕为中心的认知框架。在他们的观念意识中，海外贸易作为一种商业活动，仅属于可有可无的治国之“末”，而农桑经济才是立国之本，为此，常施行禁海政策。而福建经济的倚海特性，使它的兴荣衰败，与朝廷“海禁”之张弛松紧密切相关。每当放开时，福建沿海经济就繁荣发展，生气勃勃；每当严禁时，就凋敝不堪，民不聊生，于是民众常采取啸聚为盗、漂海抢劫的极端方式，自行投入海洋的怀抱。正如明代官员许孚远所言：“东南滨海之地，以贩海为生，其来已久，而闽为甚。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涛而轻生死，亦其习使然，而漳为甚。先是海禁未通，民业私贩。吴越之豪，渊薮卵翼，横行诸夷，积有岁月，海波渐动。当事者尝为厉禁。然急之而盗兴，盗兴而倭入。嘉靖之季，其祸蔓延，攻略诸省，荼毒生灵。”^②

与统治者以陆地农耕为本位，惧海、禁海乃至绝海的心态与做法相反，闽籍出身的郑成功，却走上“通洋裕国”之路，发挥其家族性的经商特长，以海上贸易的赢利作为军费来源，使郑氏及其后人得以在厦、金以及台湾坚持抗清斗争达数十年之久。正如郁永河在《郑氏逸事》中所言：“成功以海外弹丸之地，养兵十余万，甲冑戈矢，

① 王象之：《舆地纪胜·福建路》，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53页。

② 许孚远：《敬和堂集·疏通海禁疏》，载《明经世文编》卷四〇〇，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出版，第4333页。